

毛泽东与新疆社教运动

张瑜,李惠康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南湘潭 411201)

摘要: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针对“反修防修”的问题,紧张的国际国内局势,决定在神州大地开展一场彻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维护共产党的政权。新疆地区也在同一时刻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在新疆境内发动了这场运动,研究新疆自治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当代社会主义建设以至以后都有着巨大的作用。

关键词:毛泽东;新疆;社教运动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13)11-0171-03

一 毛泽东历来重视新疆这一边陲之地

新疆战略地位异常重要,一直以来,毛泽东都十分重视新疆这块土地,十分关注天山南北的儿女,密切重视新疆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他领导了新疆人民翻身得解放,让新疆人民自己当家做主,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帮助组建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减轻新疆人民负担,改善当地的社会经济;协助建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让当地人民,自己管理本民族事物。此外,他同新疆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有着莫大的关系。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邻近中亚、南亚和西亚国家,是中国同多国的缓冲地带,属西北的门户,乃牵一发而动全局之地;其次,新疆民族多,成份复杂。目前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锡伯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满族、达斡尔族、俄罗斯族、塔塔尔族等13个历史悠久的民族,还有东乡族、壮族、撒拉族、藏族、彝族、布依族、朝鲜族等共47个民族,各个民族习俗各异,因而管理困难;再次,新疆地区又参杂着宗教以及历史的因素。一直以来,新疆除传统的伊斯兰教外,还有佛教(包括藏传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等。且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思潮的传播以及外国势力策动分裂活动的影响,故使得新疆一直存在着民族分裂势力的隐忧。因而总得来说,新疆地区地理位置重要,但其治理却又极为不易,怎样统治这样一片“僻处西陲,孤悬塞外,内部则民族复杂,文化落后。复以各其特殊之宗教与习尚,每易为人煽惑,事变纷起,造成民间仇恨及残杀之惨剧”的戈壁之地,促进新疆的发展与稳定,维护我国的社会安定,这给毛泽东带来了很大的难题。

20世纪的60年代,在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阶级斗

争、形势、矛盾等字眼重新提上了党和政府的工作会议里,认为党内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存在着资产阶级复辟”的观念重新又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毛泽东认为,在国内广大农村地区,存在着包产到户、“单干风”的现象,“加之由于严重的经济困难,个别地方一度出现地主反攻倒算的情况,农村的社会治安也由于经济困难而有某些恶化,一些农村干部的贪污腐化现象也有所增长,城乡投机倒把呈现上升趋势”^[1];在国际这个更大的战场上,60年代的中国也进入了外交的困难年代,国际反华浪潮的高涨,中苏关系日趋紧张并逐渐恶化。按照当时中国一篇评论的说法,“1963年是国际上各种反动势力的反华大合唱十分嚣张的一年,这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泛滥的时候,也正是敢于坚持真理的战士们不断涌现的时候。”苏联自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以后,一度宣扬想控制各国的共产党,实现苏联一统天下的局面,但是,随着苏联修正主义的出现,使得赫鲁晓夫的奢望成为了泡影。鉴于苏联的教训,考虑到国际国内的局势,毛泽东认为在全国开展一场社会主义的教育运动已是十分之迫切与必然。毛泽东关注的主要是农村的社教运动。

二 毛泽东与新疆社教运动的关系

1962年4月,新疆发生了伊塔事件。伊犁、塔城边境地区6万余居民逃往苏联,5月29日,伊宁市及其郊区又发生了外逃事件,少数暴徒趁此机会发动了反革命暴乱。针对新疆伊塔事件,1963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对新疆地区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一定要改善新疆人民的生活,要比苏联还好。要在生产发展、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改善的基础上,加上政治挂

帅,加强思想教育。”“一定要搞好关系,团结绝大多数人。要发挥少数民族部队在反修斗争中的作用,要组织民兵,依靠贫下中农,警惕修正主义颠覆破坏。”^[2]毛泽东的指示被新疆自治区的领导认真贯彻并得到了执行,他们出台了《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对新疆工作的指示,加强政治挂帅的报告》,新疆地区“加强思想教育”的专题在新疆重新被提上了日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把工作重心集中在思想教育上来。毛泽东的指示,给新疆人民指引了前进的方向,确保新疆人民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掉队、不偏离,确保新疆地区可以得以继续发展和稳定。

随着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文件的指示的下发,全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新疆自治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紧随时势开展开来。新疆自治区以第一书记王恩茂同志带头,亲率工作组深入社队进行试点。新疆自治区社会教育运动的内容是在农村开展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在城市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其中,在农村的“四清”运动是新疆自治区社会教育运动的主战场。而“四清”运动则主要表现在清经济上。针对当时基层单位存在的一些贪污盗窃、多吃多占社员便宜、以及一些投机倒把的现象,采取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的小“四清”运动。

1. 新疆地区的社会教育运动到底怎么开展,刘澜涛提出:“搞社会主义教育还要注意不同地区,例如新疆就不同。”毛泽东说:“要注意不同地区。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的做法要有不同。西藏、新疆做法要有不同。甘肃、青海、宁夏也要注意民族地区的特点。”^[3]因而在对待新疆自治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自治区的领导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形成了自己特点:它力求达到点面的结合和兵团、牧区、社区三地工作的互相配合协作,使得新疆社教运动的范围得以覆盖新疆的大部分地区。在自治区开展的第一期的社教运动中,就有118个公社和21个牧场进行试点,“第二期社教从1964年11月开始,主要在12个点,即6个县、两个牧业社、一个牧场和生产建设兵团的3个团场进行,至1965年8月结束,在全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面展开时,牧区的社教试点工作也在21个社展开,并在大部分牧场开展了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4]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认真做到了毛泽东所要求的“有领导地、分期分批地、有步骤地”去推行运动,并同时在开展运动时,彻底做到了实事求是,当发现新疆在1956年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没有划分好阶级队伍时,决定有针对性地对牧区进行完全的“民主革命的补课”,以达到纯洁社会主义革命的组织,建立贫困牧民协会的阶级队伍,顺利地开展好新疆的社教运动。

2. 对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毛泽东说:“从基本上说,不是派人去的问题,而是依靠群众,依靠省、地、县、社的广大干部。把广大干部群众发动起来,这是最主要的。用这种方法,自我教育的方法,来办好人民公社。”“工作队的任务,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进行指导和帮助,启发基层干部善于分析问题,确定方针和办法,而决不能包办代替。”^[2]因而,在新疆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自治区的党委和政府特别注重新疆地区干部与群众的配合,

发挥工作队的参谋作用。在具体的运动当中,省、地、县三级领导干部首先主动站出来,“洗手洗澡”,“端正阶级立场和改正思想作风”,起好带头的先锋作用;此外,群众也在这场运动中被很好地发动起来,因为广大人民是社会生产劳动的主要参加者,是社会的基本组成人员,同时又承担着监视和改造四类分子,监督和帮助领导、干部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抵制社会不良作风,发展集体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只有把人民群众团结在社会主义的怀抱里,才能不让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钻空子,才能更好地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工作队队员在社队蹲点,每天除跟社员一起劳动,在生产队开会外,还得负责在生产队宣传党中央的政策,每天劝说动员生产队长、会计、保管员交代自己的问题。每天和地、富、反、坏、牛鬼蛇神训话,让他们不要乱说乱动,不要破坏运动,走资产阶级道路。每天向社员,特别是青年社员,进行阶级教育,以便尽量团结和改造更多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因而,在新疆自治区整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很好地做到了干部、群众和工作队三结合,做到领导干部积极主动参与,老实交代;群众发挥主人翁精神;工作队不搞神秘化,开诚布公地面对群众。三者紧密结合,确保自治区的各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3. 毛泽东时刻关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发展,他对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目标也十分地清楚,是为了清理阶级队伍,整顿阶级组织,使之适应生产的需要,发展的需要。因而在具体运动过程中,特别担心出乱子,搞过了头。故针对在实际试点过程中出现的混淆两类矛盾、打击面过宽的问题,他组织起草和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纠正了前期的一些错误,给新疆社教运动指明了更为清晰的方向。于是在毛泽东的指引下,自治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以教育干部,纯洁队伍,整顿组织,建立革命化的领导班子为主。教育是其主要途径,惩罚只是它的一种手段而已。因而在这次运动中,“除了行凶报复、杀人、抢劫、放火、放毒因而民愤很大的这一类现行犯必须立即逮捕法办以外,对于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基本上采取一个不杀,大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捉的方针。”^[2]所以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即使对那些少数必须逮捕的且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也是先放到群众中进行斗争,接受群众的监督,借以达到揭露敌人、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的目的。到后期,则得审查、批准、再依法进行逮捕。且在捕人时,还得遵循两条严格的标准:其一,罪恶大,证据确凿,又不知悔改;其二,需要绝大多数人民群众要求逮捕。争取放手发动群众,一切重大的问题都要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要鼓励群众充分发表意见,重大事情都应该让群众自己来参与、决定、表决。如果主动坦白自己的问题,则应该采取宽大处理的原则,因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可以教育改造成为好人的,只是某一间断、或某一时间没能受得住诱惑,而犯了错误;还有他们本身就是社会劳动力的一部分,把他们教育过来以后的价值,远远大于把他们关起来或是杀掉的价值;最后,在正确对待地主、富农的政策上,也按毛泽东下发的规定出发,采取善待与宽待的方针,这从微观来看,对一个家庭来说,更好地有利于他们的子女,有利于他们在一个健全的家庭苗壮地成长。

三 新疆社教运动对当今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

根据毛泽东在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除了在农村搞“前十条”,还要在意识形态方面抓一抓,如文艺领域上,也要搞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因而从这次讲话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范围扩大了,以至后来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毛泽东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在意识形态领域,尤其是文艺方面,以至之后他用一场文化大革命取代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尽管说社会主义教育让位于文化大革命,但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新疆自治区发展的历史上却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它纠正了经济上管理不善之风,以及贪污浪费、偷工减料等现象,促进了新疆自治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到1965年,新疆国民经济胜利结束了调整,全区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4.38亿元(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下同),比1957年增长132.5%,其中农业总产值12亿元,比1957年增长98%;工业总产值12.38亿元,比1957年增长179.5%;原油973吨,比1957年增长9.2倍;棉布1.4亿米,比1957年增长3.75倍,自治区生产的棉布已自给有余,并运销内地。”^[5]新疆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好的改善,日子过好了,新疆人民由衷地感谢毛泽东,亲切地称毛泽东为“我们的父亲”,说毛泽东比他们的亲身父母还要好。当时很多的新疆人民都恨不得能够到北京天安门看望他们心里的“红太阳”、“大救星”。

它很大程度上肃清了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问题,恢复和发扬了党在革命时期的光荣传统。随着五年计划的完成,三大改造的实现,物质生活逐渐丰富多彩,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党的一些领导干部经不住“糖衣炮弹”的袭击,开始出现多吃多占,铺张浪费,挪用公款,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现象,还存在着做官瞎指挥,欺压群众,官僚主义盛行的封建风潮,使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越走越远,干部和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给社会稳定带来了隐患。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某些干部及时刹住脚跟,做到“洗干净手,洗干净澡”,没有在泥潭里继续深陷,党风得到了重振,确保了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民主与法制的力量得到了加强,干部作风的提高,给僵化的队伍注入了新鲜的力量。干部队伍的重新建构,给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当今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提供了借鉴作用。

最重要的是,它强化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增强了党的凝聚力、战斗力,使人民牢牢的聚拢在党的旗帜下。经由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改变了过去各民族分裂主义的局面,培养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的认同感,促进其自发地爱国,使其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有一种由内而外的喜爱和认同,让他们对中国这个大家庭有一种归属感。此外,历经这场运动,促进了汉族与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交流,在这次运动中,工作队里头,很多的成员都是汉族干部,他们吃住在当地的社员家中,参加各地试点工作时,同当地的干部与群众都有着深刻的沟通,打破了各民族之间的种种隔阂,加深了各民族人民彼此之间对民族观、宗教观、文化观的认识。

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后期毛泽东思想的逐渐偏“左”,“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很多的干部在此次运动中被划分为“资产阶级的当权派”,受到了极其不合理的对待,使得很多好的干部,离开了他们的工作岗位,使干部对党的信任大打折扣,且这样一批有能力、有经验的干部的流失,对当时的社会生产来说,是一项很大的损失。再者,它负面影响最大的一点在于,它对于农村的“单干风”十分地排斥,甚至在到了1965年,新疆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没收自留地等现象,在经济建设上也不再提按经济规律办事,一切强调“政治挂帅”,思想上越来越“左。”“政治挂帅”,政治高于一切,迫使一切让位于政治,导致了新疆工作的重心都到了政治之上,经济以及文化生活出现停滞不前的现象,新疆地区难以有所发展,有所突破。而此时,“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模式,也深深地影响当时的中国。具体表现在:在社会主义的探索上,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凡是党内外不同的意见和声音,都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那些干部也被认定为“资产阶级的当权派”,因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党内外出现了一种十分紧张的气氛,很多人开始战战兢兢地过日子,不敢有自由表达的机会,只敢随身附和,人民的自由权利遭受到禁制,社会主义民主逐渐破坏殆尽。而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也出现中断,社会没有了创新。相对地,在“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前提下,凡是不被领导认同的声音,都可以被打倒,不需要按照严格的法律程序,因而乱批人的情况数见不鲜,社会生活开始背离了法律的轨道,法律被忽视,成为一纸空文。相伴随地,法律意识的缺失引发了毛泽东的个人独断之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愈演愈烈。而缺少了监督的个人独断又相应地会出现思维的狭隘,个人喜恶的情感的参杂,又会有决策的失真或是失误,对社会主义的建设而言,又是一个大的危机。

毛泽东与新疆自治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给当今的新疆人民留下深刻的教训,但同时,它也是一笔无形的财富,它督促着新疆人民在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参考文献:

- [1] 郑 谦.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56-1965)[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 [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 1962.1-1963.12)[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 [3] 逢先知,金冲及. 毛泽东传(1949-1976)[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 [4] 张玉玺,党育林. 当代中国简史[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
- [5] 朱培民,段 良. 中共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与新疆[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王小飞)